

# 中国的“赶超型现代化”

王 雅 林

文章认为,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现代化的“赶超型”客观性质和发展速率,是认识和解决中国现代化一系列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出发点。为实现赶超发展,必须把中国现代化的动力看作是“社会动力资源系统”。文章从社会的经济系统和社会整体系统、中国和世界、当代发展和未来发展以及社会发展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共性和个性、主体和客体等六个关系视角,揭示了这种动力系统和结构并从中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理论问题。作者认为,在今天把“代价”提升为科学范畴具有很大意义。从发展学的角度看,“代价”应属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花费的“社会成本”进行“成本—效益”或“投入—产出”分析的综合性概念。为此,作者还依据新发展观对代价范畴和中国赶超发展中的代价问题做了具体阐述。

作者:王雅林,男,1941年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在当今的国际经济格局和世界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具有赶超型的性质和特征。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中国赶超型现代化的客观性质和发展速率,是认识和解决中国现代化一系列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 一、赶超型现代化的内涵

从18世纪开始的世界现代化总体进程角度看,当今第三世界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在客观进程上都属于赶超型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是指:第三世界后发国家在现代国际经济体系影响下,充分利用后发优势,采取适合于自己的高效率途径,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先进国家,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加速实现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转变,从而迅速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和适应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sup>①</sup>这一表述的核心内涵是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问题。以突出经济的赶超发展为特征的赶超型现代化,应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采取的现代化发展类型和发展模式。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后发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自身现代化的赶超性质,在60年代我国首次完整地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时就有了明确表述:“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我们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我们应该迎头赶上,也可以赶上。”<sup>②</sup>但自60年代下半期以来,经历了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性挫折,痛失了经济上赶超发展的机遇,直到1979年以后通过改革开放我国的

① 参见罗荣渠:《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探索》,《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第54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2—413页。

现代化建设才走上了加快发展的轨道。

后发国家能够实现赶超发展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后发效应原理,即现代化起步晚的国家在发展中既有面对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秩序等特殊制约因素的负面条件,同时又有可以直接学习和引进发达国家已创造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一切文明成果加快自己发展步伐的有利条件。后者属于正面效应,被称为后发优势或落后之益。发展中国家如能趋利避害,就可以实现赶超发展。但在当今世界,远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具备了实现赶超发展的主客观条件。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是,直到今日,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比如,1960年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人均收入差距为10:1,1970年为14:1,80年代以来进一步扩大。如今发达国家同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差200倍。但东亚地区却一花独秀,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这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赶超发展,还必须从自身内部创造有效的后发优势条件。当前中国实现赶超发展不但具备有利的国际条件和周边环境,而且完全具备了自主、自觉、自力的内部发展条件。

依据我国制订的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我国到下个世纪中叶大体完成现代化任务。在今后的60年中,中国实现赶超发展的具体涵义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从经济增长速度上来看,我国的经济增长不但要大大超过早发国家工业化时期的增长速度(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年增长率为3%左右)及其后的增长速度,同时也要达到或超过亚洲“四小龙”60年代经济起飞时期和当今的增长速度(“四小龙”60—8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为8%左右)。

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的1979年至1991年,国民总值平均年增8.6%,速度居世界第二;工业年均增长12.2%,高出世界年均增长近10个百分点;农业年均增长5.9%,高出世界水平4个百分点;人均国民总值年均增长7.5%,高出世界水平6个百分点。13年中人均国民总值翻了一番多(增长1.34倍),而美国在经济发展初期实现人均产值翻番用了40年,英国用了60年。上述事实可以说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增长速度上已实现了赶超式发展。90年代我国的增长速度要达到8—9%左右,同样表现为超高速增长。

2. 从完成现代化所花的时间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中国可用100年时间基本赶上发达国家的300年左右时间所达到的发展水平。

3. 从跨越的发展阶段来看,根据“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如果说下个世纪中叶我国的发展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話,那么就意味着今后要用6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双重跨越,实现现代工业化,即不但要完成早发国家由18世纪中叶起到20世纪中叶这200年间所完成的以大机器工业和电气化为标志的产业革命任务,也要完成自本世纪70年代起以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和生物工程等新技术革命为标志的后工业社会即信息社会的任务,达到21世纪中叶新的现代化水平,即那时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4. 从产业结构变动的角度看,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产业结构将完成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的升级过程,预计2010年可达到英格尔斯提出的现代化标准,即第三产业总产值占国民总产值的45%,下个世纪中叶可达到那时的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sup>[1]</sup>

5. 以上赶超型现代化的具体内容是从总体特征和长期趋势上加以表述的。具体的发展过程必然是具有波浪式前进的特点,即某一个发展阶段稍高一些,另一个发展阶段又可能稍低一

[1] 参见张琢:《九死一生——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2—294页。

些。但总的看又应表现为台阶式上升的加快发展规律。

上述内容所表述的以现代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作为标志的中国赶超型现代化发展过程,必将是革命性的巨型社会变迁过程。这个过程包括:①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这是一个全面的社会转型过程;②实现从社会主义的旧体制向新体制、从指令性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③中国的赶超发展是在以新技术革命为先导的全球经济“指数发展”基础上的加速发展;④伴随着现代工业化的进程,整个社会的结构、体制和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必将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因此,中国赶超型现代化发展过程是在快速、浓缩运转中所完成的极为复杂的一大社会系统工程。

## 二、赶超型现代化的社会动力资源系统

如果说赶超型现代化内涵中突出的是经济加快发展和经济实力增长的话,那么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揭示、聚集实现赶超发展的动力资源。这种动力资源系统可以由以下六对关系加以揭示。

1. 从社会的经济系统和社会整体系统关系的视角看,赶超发展的动力体现为社会多因素互动所形成的合力。

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处在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科技诸要素互动构成的复杂社会系统网络之中。作为社会有机组成部分的各要素具有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耦合关系,每个要素既是社会整体发挥功能不可缺少的条件,又是其它要素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正是这些要素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推动着整个社会的前进运动。在社会有机体之中,寻求经济发展的动力首先涉及到经济系统内部要素的互动关系,所以我们要对经济系统内部的结构、体制和要素、关系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是很重要的,但同时也要研究其它因素的作用。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具有跳跃性、革新性和借用性(引进先进生产力)的特征,而产生这些特征的先导力量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于后发达国家来说,科学技术的应用具有极强的可借用性,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美国未来学家认为,在新技术革命面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所以我国要实现赶超发展,必须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引进和发展。但是新科学技术的引进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命运,它们在不同社会经济关系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结构都能对科学技术产生有效的需求。可见科学技术巨大作用的发挥需要与其它社会因素与之相匹配。再如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是巨大的,但为什么在我国中西部一些地区很难落地生根,或者常常扭曲变形反而成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呢?这也说明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文明同样需要各种经济的、社会文化的因素配合。因此,我们必须把经济增长的动力看成是社会多因素互动所形成的合力,这种动力既包括“技术—经济动力系统”,又包括非经济的“社会—文化动力系统”。

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上,目前依然存在着对马克思“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理论模式进行片面的解释和用来套用现实生活实践的倾向。按这种解释,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等精神因素同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是“远亲”,中间隔着许多层次,两者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因果关系,精神的因素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反作用。这种认识割断了同马克思实践的观点、社会系统论观点的联系,在实践上造成的弊端就是,忽视社会的和精神文化因素的动力作用。但是,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经济飞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那里人们的观念新,敢领风气之先;而在东北地区的一些地方,自然资源丰富,工业基础

雄厚,科技力量也很强大,但改革开放的步伐却较为缓慢,究其原因,恰恰在于那里缺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文化和价值观念。这正好说明了为了克服旧信念的阻力并孕育一套新的更合适的价值观所需要的努力和时间部分地说明了每个时代的时间长度的道理。所以我们不赞同“文化心理因素决定论”的观点,但精神、文化的因素对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足轻重的“小字辈”,经济和精神文化因素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二元的,而是互相依存的,精神文化的因素同样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资源和“一只看不见的手”。1992年,邓小平同志总结了我国近十几年的经验,用“换脑筋”的形象说法深刻、敏锐地揭示了精神、文化因素在推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中的巨大作用,这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新发展,其意义不亚于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指出推动经济发展的是社会多因素互动所形成的合力,对于指导我国实现赶超发展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第一,有助于自觉把握社会诸因素互动的“协调—不协调—新的协调”的辩证发展过程。在现代化发展的较长时期内,由于加快发展经济具有全局性的重要地位,因此首先是那些同生产力发展直接相关的因素得到优先发展,不可能做到所有社会因素同步发展。突破旧的均衡是发展所必须的,但是在经济启动之后又要求社会的整体协调发展。我国现代化发展的现阶段,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经济自身的因素,容易忽视社会性因素滞后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而这种不协调又将制约生产力的发展。因为依据“木桶原理”,最终限制水的容量的恰恰是最短的一块木板。这就要求我们把握好社会诸因素之间“协调—不协调—新的协调”的辩证发展规律。第二,在我国,为了尽快缩短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但目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已高达60%以上,有的国家甚至高达70—80%,而我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在短期内尚难以达到这个水平,所以单有这一因素还不能完全保证实现赶超发展。但发达国家的社会整体结构变动的余地相对来说较小,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通过结构转换合理配置、发挥合力作用的后发优势的潜力尚很大。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结构的转型同样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sup>[1]</sup>。

## 2. 从中国和世界关系的视角看,开放是强大的动力资源。

上述问题是从社会系统内部的关系讲的。为了实现赶超发展,还需要从我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角度寻求动力资源。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产生以来,现代的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在广度上的迅猛发展造成了全球性的世界交往,使各国家、各地区在孤立的条件下不可能获得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就必须建立开放的经济体系、发展国际交流合作、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这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所以新的全球观、开放观应确立为实现赶超发展的世界观、发展观。在保持自主前提下的对外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关于一国的经济要不要和全球的发展挂钩的问题,在发展理论研究中曾存在激烈的争论。作为对具有“我族中心主义”倾向的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而形成的早期“依附理论”主张,在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落后国家必须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脱钩以摆脱依附状态,否则就不可能取得发展。但60年代初,当这种“依附理论”正在扩大影响的时候,亚洲“四小龙”却通过调整汇率、实行优惠税收和信贷政策等措施发展外向型经济,逐步建立了开放的经济体制。韩国在60年代的10年中使出口增长25倍,台湾和新加坡在70年代增长13倍,香港在同

[1] 参见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期增长9倍。他们正是在利用外国的需求市场和先进技术的过程中实现了产品的更新换代,实现了经济的高增长率。他们“视全球经济为一大挑战,他们认为‘依赖’不是一个无法逃避的‘死棋’,而是可以用来改善人民生活、经济能力和国家财富的方法”<sup>①</sup>。新的发展事实使得早期“依附理论”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成为“新依附论”。“新依附论”认为“依附性”和发展并非水火不容。在“依附论”的基础上产生的“世界体系论”也克服了“依附论”的某些偏激观点。

我国在中世纪曾是当时世界上的发达大国,从文明的传播角度看我国主要是个输出国。但当鸦片战争敲开中国大门、一些志士仁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中国已沦为停滞落后的国家。所以从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客观进程就具有了外启性、逆传导性的特点,从那时起开放、学习先进已成为一个后发大国的必然选择。这十几年来,我国沿海地区经济超速发展的经验证明,一个地区对内对外开放的程度越高,越是把自己的经济发展纳入国际经济的大格局中,就越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及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和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也就越能提高生产率和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提高国际竞争力。同时,只有开放才能把握世界发展的大趋势,理解旧体制的弊害,知道应该改什么和怎样改。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改革、开放两者相互促进的内在关系中,起点和首要环节是开放,不开放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 3. 从当代发展和未来发展关系的角度看,把握未来是赶超发展的时间能源。

如果说从中国和世界关系视角探求的是赶超发展的空间资源的话,那么从当代和未来发展关系视角所探求的则是通过时间隧道,从现在和未来的时间落差中获取发展的时间能源。这就是说:中国要在未来的60年中实现赶超发展,必须对未来世界发展趋势做出长期预测,研究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条件、限制因素以及动力和手段。全球规模的经济所带来的资源与能源危机、生态平衡失调、人口增长失控和各国各地区贫富悬殊的拉大等问题,都将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但是,当我们即将跨入下一个1000年的时候更应思考的是:在未来,什么是主宰沉浮和推动各国发展的主要力量?对这个问题失去敏感或不做深入的研究,就可能在未来的发展中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地走,失去主动并永远落后,在综合国力的较量中败北。

许多国家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未来学家和战略学家都对这一问题做了许多论证和预测。我们仅举我国读者所熟悉的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和奈斯比特新著《权力的转移》和《90年代世界发展十大趋势》的观点。托夫勒认为,在21世纪到来时,知识正在取代昔日金钱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成为权力的主要象征,谁握有大量知识,谁就能在未来的世纪中获胜。奈斯比特指出,“信息社会中的全球经济竞争,人的素质和创造精神将决定一切”,“知识就是力量”,是“推动未来发展的动力”。1993年新年伊始,日本报刊发表了同样的观点:当今,实际上具有控制能力的“资源”和能够做出最终决定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和土地,也不是劳动力,而是知识。中心环节是把知识应用到劳动中的“生产率”与“技术革新”。这些因素很可能创造“经济奇迹”,“使至今仍然处于贫困中的国家旧貌换新颜,形成高度发展的经济实力”。<sup>②</sup>

这些观点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当我们在未来的60年中致力于赶超发展及实现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双重超越任务的时候,“更重要的是认清推动未来的动力,而非造就过

① [台湾]高棣民:《东亚新兴工业对理论的挑战》,见肖新煌主编《低度发展与发展》,远流图书公司1986年版,第14页。

② 彼得·德鲁克:《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的经济》,见《钻石》周刊1993年新年特别号。

去的力量,这样你就会拥有应付现实的能力”<sup>①</sup>。所以,我们应当有眼光有洞察力,紧紧把握未来世界发展方向和主宰沉浮的力量,在制定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中增加面对未来的自觉选择成份,站在未来的时空高度规划今天的行为方式。这样,虽然现代化发展的一些基本阶段不能超越,但可以采取相对于传统工业化道路来说超常规的手段和方式,绕过传统工业化的一些发展过程和环节,在未来的60年中实现工业化和赶超先进的双重推进。为此,对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做预测研究就有了重要意义。

4. 从社会发展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关系的视角看,机遇是宝贵的发展动力资源。

从19世纪中叶中国现代化发轫始,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40年中,中国现代化发展多次丧失机遇,以及近十几年来通过改革开放终于抓住机遇获得高速发展的正反经验,使中国人民深深懂得,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把握机遇是多么重要。重大的实践提出了需要突破把社会看成单纯遵循有规律的因果法则而前进运动的传统发展观的问题,需要对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及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关系的含义做出新的解释。依据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成果所形成的新发展观,已赋予了偶然性、随机性、非确定性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普遍的、根本的意义。这种不确定性、偶然性、随机性因素就体现为发展机遇。“机遇律,它们是用数学上的概率论表述出来的”,表现为“有规则的偶然性”,而“偶然性可以通过统计平均进入决定论,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社会决定论形式之一”<sup>②</sup>。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机遇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和稍纵即逝的;同时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越高,越有活力,所遇到的机遇就越多。因此善于捕捉和把握机遇将成为指导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所谓抓住了机遇,就是抓住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各种发展要素和自身发展优势的最佳时空聚合点,做到了这一点就会产生一种突破性的力量,实现社会和经济的跳跃式发展。我国在当前国际国内条件下就遇到了加快经济发展的大好机遇,无疑应当抓好用好。由于机遇表现的是偶然性的规律性,所以变潜在的机遇条件为现实的发展动力资源,除需要较强的机遇意识外,还需要较高的主体条件。对我国不同的地区来说机遇是各不相同的,但由于主体条件不同,有的就抓住了,趁势而上,大步前进,有的则“捧着金碗要饭吃”,放走了一个个发展机遇。从这个意义上说,机遇是为有准备的人而准备的。

5. 从发展的共性和个性关系的视角看,保持特色将为经济发展带来无穷的内源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发展观研究上的另一个积极成果是,发展中国家普遍抛弃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单一模式发展观,强调各国的发展模式应当是多元的,各国的现代化既要遵循普遍的发展规律和要求,又要从各国不同的国情实际和文化特点出发,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第三世界国家的经验证明,任何成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都体现为发展道路的共性和个性的统一,走自己的道路,保持特色。

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不盲目照搬别人的发展模式,一切从自己的国情实际和文化特点出发,从人民的实际需要出发,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这样就能从社会内部和人民中间产生巨大的凝聚力,调动起一切历史的和现实的、物质的和文化的资源,从而使自身的优势得到发挥。所以,保持特色不仅是一种必然的模式选择,也是发展的动力源泉。“一个社会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确认自己的文化特性,对于动员一切力量来发展而言,具有根本

① [美]约翰·奈斯比特等:《90年代世界发展十大趋势》,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页。

② 参见李明华:《历史决定论的三种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第53—66页。

性的意义”。<sup>①</sup>我国改革开放十几年以来之所以在经济建设上取得巨大成就,就是因为坚持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条发展道路充分体现了现代化发展的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所以才充满了巨大的活力。我国东西南北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发展条件相差很大,但都蕴育着独特的内在发展基因,各地的发展模式同样应当是坚持共性和个性辩证统一的关系,保持特色,一切从实际出发。

6. 从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客体关系的视角看,人的现代化是赶超发展能动因素的源泉。

以上是从社会结构的不同客体层面对赶超发展动力的探求。但是,任何社会都不存在游离于主体之外的社会客体要素之间独自进行的互动作用。社会客体要素互动规律的唯一基础是作为社会发展主体的人的能动性,是人的自我超越。社会客体和社会主体、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总体化进程,构成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现代化辩证发展的动力学基础。

如前所述,后发国家实现赶超发展的主要依据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即通过传播、采借机制大胆吸收和消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和一切人类文明进步成果以加速自身的发展步伐。但是正如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所指出的那样,传播和采借固然可以跨越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内在的不成熟性,但是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必要的经济发展基础,二是国民的现代化选择动机和素质准备,即必须在人民大众中涌现一大批现代化、产业化的“实际承担者”,“这就是掌握现代化技术的技术人员,具备一定的资本、事业能力和企业家精神的实业家,具有熟练能力的工人和具有购买力、作为买主而出现在市场上的消费者等等”。以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为例,“在现代产业技术从西方传入不久就涌现出大量的这种承担者,这是日本的产业化在短期内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sup>②</sup>本世纪7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为适应世界经济的结构变化,都适时地进行了以科技开发和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为先导力量的经济结构转换,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得以顺利实现经济结构转换的先行条件是人才结构的先行调整和准备,是人力资源的超前发展。国际高级经济专家的研究成果表明,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强烈的正向关系性。强化和超前发展人力资源,是“四小龙”经济发展成功的重要原因。

日本、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要实现赶超发展,根本条件仍然是提高人的现代化素质,造就大批现代化的“实际承担者”。这一点对于在未来的60年中不但要走过传统工业化道路,而且要达到21世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双重跨越”的中国来说尤为重要。我国在实现赶超发展中,土地、矿藏、资金等资源都是有限的,但高素质的人才资源却可以成为最大的替代资源。也只有拥有较高的现代化实际承担者,才是使潜在的后发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后发优势的根本保证。为此,同社会的客观发展进程相比,我国在人的发展和素质的提高上应保持超前的势头。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我国作为现代化后来者,可以突破自身经济社会条件的限制而通过开放途径培养掌握现代知识的人,具体可通过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和大众传媒事业等,特别是在现代化实践的课堂上造就新的发展主体。通过以上六个方面对社会结构和过程的多视角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构成赶超发展动力的是一个多因素、多层面的复杂的社会动力资源系统。这也构成了我们的“大动力观”。但是,这一复杂动力系统的运作,尚需要有现实的启动器和杠杆。在我国,这种启动器和杠杆就是改革。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内源发展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② 参见[日]富永健一:《社会学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309--310页。

### 三、赶超型现代化的运作机制

根据国际经验,在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力量的组合、运作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过程,为了使各种力量按预期方向发生有效的聚合反应,就需要有可操作的调节手段和机制作为保证。这些调节手段和机制有以下几种。

1. 创新。创新是指将各种新的技术、制度、思想等首次引入社会经济发展之中。它既包括技术的发明、革新,也包括经济、政治、组织、制度方面的革新以及观念的变革。大规模的创新称之为创新群集。美国学者罗森堡和小伯泽尔在《西方致富之路》这本名作中,详尽地分析了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管理上的种种创新,如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市场及其对创新的奖励、科学家和企业家结合对技术革新的推动、政府管理方式的革新等等。我国是后发国家,但是我们选择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我国所面临的国际条件是新的,国情也是独特的,因此创新仍然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机制。正是经济的、技术的、政治的、制度的和观念的各种创新,才能突破传统的陈旧体制的束缚而实现社会的转变。在各种创新中最常见的是技术创新,最难的是社会体制和结构的创新。没有后者,技术、经济、政治的发展其行不远。

2. 积累。现代化发展从性质上看是革命性的巨型社会变迁,但从过程上来看却是渐进性的发展。无论是早发国家还是实行赶超战略的后发国家,都要经历上百年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长期积累过程。比如,西方国家在今天经济社会发展已达到很高水平,但在其现代化起步后漫长的年代中,物质增长率只是略高于人口增长率。日本在1868年以后仿效西方工业化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但也是通过上百年的微小增长而取得的。点点滴滴的新知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积累的。物质文化的发展取决于经济增长率加上文化积累率。所以积累是发展的重要机制,即使今天我国在实行赶超发展战略时,也必须把握发展的渐进性和积累机制,欲速则不达。

3. 采借。即通过对外开放,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外一切先进的技术、工艺、文化、制度的过程。在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因素对尚处较低发展水平的国家具有强烈的传导性,而国际竞争机制又使这种传导性变成一种自觉的律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传播过程主要体现为学习先进以缩短自己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在当今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下,传播、采借又是一个充满斗争的复杂过程。

4. 试验。如果说创新是实现赶超发展的主要机制的话,那么任何创新、革新、改革都有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但在推行创新措施时又需要考虑收益和成本。降低创新风险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试验,通过试验可减少创新中可能发生的失误,并为创新、革新的成功开辟道路。凭借市场机制,革新者要担负试验失败的损失,但也应保证他们从试验的成功中获得利益。在我国,无论是创新还是成功的采借,都需要采用试验的手段。另外,我国在宏观指导思想虽然初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但在实践层面仍有一个艰难探索的发展过程,所以在每个发展阶段尚需依据具体情景“摸着石头过河”,通过试验机制开辟道路。

5. 调适。即对现代化中各种动力、各种社会要素和各种利益关系的协调、配置和适应性的结构转换。没有各种动力的有效组合和社会整体结构的协调,是不可能形成赶超发展的和谐、有序运转秩序的。为此,形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取向的、具有强大凝聚力和资源动员能力的权力中心就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同时,发挥理论在现代化发展中的科学、理性的指导、规划、预测



职能也具有全局性的战略作用。

#### 四、赶超型现代化中的代价问题

全面地把握赶超型现代化的进程,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察视角,就是不但要考虑发展的正面效应,还需考虑发展的负面效应。这就有一个权衡利弊得失问题。在这方面的思考,就是发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著作中经常出现的代价问题。

代价是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所花费的社会成本进行成本—效益、投入—产出分析的综合性概念。对于这一表述我们可以做如下阐述。第一,任何经济发展特别是赶超式的发展都必然要付出痛苦代价,做出牺牲。美国的发展学家威尔伯教授主编的《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一书,汇集了对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代价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作者认为,工业化“总要花费高昂代价的”,但“无论是资本主义式的发展,还是共产主义式的发展,所要付出的人的代价都比继续保持不发达状态的代价要小。要发展经济,就得付出某些社会代价”,“迅速的经济增长……却是最迅速地解决继续沦为不发达状态所付出的大得多的人的代价的方法”。<sup>①</sup>第二,权衡代价应有个综合的观点。在上面的概念表述中所使用的社会成本一词,被赋予了经济、社会、生态和人的全部成本在内的特定含义。第三,代价具有不同的性质。威尔伯教授在考察经济发展的问题时提出了“代价是不是工业化过程固有的一部分”,“是不是都同发展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这一研究角度。比如,他认为原苏联在赶超发展中所付出的代价就不是发展必然固有的,而是由斯大林的极权主义性质造成的。因此,我们可以区别发展的代价和发展中的代价两个概念,前者是指发展过程“固有的一部分”,后者却包括不是发展本身必然要付出的代价。第四,代价概念在权衡得失时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和什么不是代价,值不值得付出某种代价,该付出多少代价以及由谁来承担代价。回答这些问题虽然涉及到技术性计算的事实分析,但主要表现为价值判断,因而代价属于价值范畴。

威尔伯教授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估计经济发展的社会代价问题具有复杂性,人们似乎面对一个左右为难的局面。一方面,若不改变不发达状况,就会容许无限的人间苦难继续下去。另一方面,通过加速发展来消除这种人的代价的过程,又可能产生一些新的代价;旧的人的代价消失得越快,新的代价也会越严重。”<sup>②</sup>同早发国家现代化的自发过程相比,我国在当今世界体系中的赶超型现代化具有把早发国家现代化不同历史阶段逐次出现的矛盾一揽子解决的特征,面临更多的两难选择。我们研究代价问题的目的就在于:如何在当代世界文明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汲取先行者的经验教训,绕过一些痛苦的发展历程,在实现赶超发展中用尽可能少的社会成本获得相对多的社会经济利益。为此,需要研究和权衡利弊得失的代价问题很多,如效益和公平问题、物的增长和人的发展问题、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问题、中西部地区发展和东部地区发展的关系问题、农村发展和城市发展问题、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问题等等。但是,探讨发展中的种种代价问题首先涉及到建构一种代价观的基础,从社会发展价值目标层面回答问题。

70年代以来,发展理论关于发展观的研究,已由单纯强调经济增长到形成强调以人为核

<sup>①</sup> 参见[美]查尔斯·K·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49—458页。

<sup>②</sup> 同<sup>①</sup>,第457页。

心的社会整体协调发展的新发展观。该发展观认为发展的目的是满足社会和个人需要,包括物质的需要和与每个民族的价值与传统相一致的社会、文化和精神需要,从而在发展中建立个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尽管这种发展观还有明显的缺欠,但它却反映了当代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手段和目的的实现的一致性,在于价值合理性要以工具合理性为保证。就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制约人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是生产力水平低,因此,坚定不移地以经济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是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的根本手段。离开了这一基础,再美好的蓝图也只能是水中月,特别是国内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要求和国际环境又要求我国的经济走上快车道。快发展,效率优先,从根本上比慢发展付出的代价要小。但经济的快速运行势必会产生社会震荡、失衡,社会的其它方面要做出必要的牺牲并付出痛苦代价。我们不能用世界至善论的观点看待现代化的过程,这是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我国现代化是自觉推进的现代化。根据手段一目的的辩证关系,又不能简单重复早发国家走过的老路,见物不见人,把经济以外其它事业的发展推到遥远的未来,而要从发展的初期就注意综合地处理各种问题,坚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统一、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从而也就坚持了发展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统一。这样,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又可以减轻和缩小社会代价。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中,我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其原因,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错过了发展机遇,付出了贫穷和不发展的代价;二是急于求成,违背经济规律,在经济发展上多次发生大起大落、劳民伤财的重大失误。另外,人口失控也使经济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上述失误在今后的发展中不应再现,特别是在赶超发展中要防止急于求成和短期行为,这种行为的实质是以牺牲整体的、长远的发展利益换取局部的、短期的政绩效应。

但是,当我们在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座标图上考察发展的代价问题时,又需要将之提升到新的层面,紧紧把握那些同我国人民生存、发展利益以及同全人类的利益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概括起来就是建立生态秩序和心态秩序两大问题。

不久前,费孝通教授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当前世界的形势发展已使人们觉悟到生态秩序的日形紧张”,“必须建立的新秩序不仅需要能一个能保证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公正的生态格局,而且还需要一个所有人类均能遂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sup>①</sup>

生态秩序的建立问题涉及的是经济发展和环境发展的关系问题。全球变化,已为21世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敲起了警钟。对于我国来说,我们在实现赶超发展的时候,所面对的是中国历史上空前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80年代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严重破坏的沉重代价,成为我国历史上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最严重的时期。这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生态赤字如再不引起高度重视,将危及民族生存的空间和基础,将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带来无法挽回的灾难后果,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其代价不亚于50、60年代人口政策失误造成的恶果,大大影响中国长期发展的能力。所以,我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的制定,不但要考虑经济的“瓶颈”因素,而且要有高度的环境意识,必须把生态环境保护包括进去。我们必须抛弃“高消费资源、高消费水平”、“先污染后治理”、“先牺牲后抢救”的传统工业化发展道路,保持经济发展和环境发展之间的高效、和谐关系,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的需

① 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第12—13页。

求构成危害。当然环境问题的解决又取决于把经济搞上去,消除贫困和落后。

“心态秩序”的建立涉及到经济发展和人文发展的关系问题,这更是一个富于时代挑战性的课题。时至今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二、三百年的发展,无论在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果,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它们在取得巨大的物质成就的同时,并没有解决好文化问题和人自身的问题。这一点,西方学者所做的批判常常更深刻、尖锐得多。亚洲“四小龙”在经济上创造了奇迹,但在人文发展上他们自己也感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深刻的教训。同西方发达国家和“四小龙”相比,我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有了机会和前车之鉴,可以在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人文发展的关系、解决“遂生乐业”的心态秩序方面做得更好,较少付出代价。当然这是一个相当繁难的任务。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只能是根据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充分发掘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良基因,同时吸取世界各国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加以融合改造,使之成为适于中国和人类未来发展的新型文化。这样,我们在现代化发展中就可以建立经济发展和人文发展的和谐关系,为人们提供良好的心态秩序,避免在人文发展上付出更高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赶超型现代化将要在人类现代化发展历史上实现经济发展和人文发展的双重跨越,这种双重跨越将解决至今仍使人类深深困惑的难题,从而对人类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责任编辑:唐 军

\*\*\*\*\*

## 书 讯

△邵道生著《悟透人生——中年人心理的困惑与解脱》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于1993年8月出版。全书20万字,定价9.80元。

△陶春芳、蒋永萍主编《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概观》(全国卷一)已由中国妇女出版社于1993年8月出版。全书39万字,定价12元。

△经君健著《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中国社会史丛书之一)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8月出版。全书20万字,定价5.50元。

△《中国当代高级科技人才系列词典》编委会,历时半年整理出百多万名现供职于科技、新闻出版、医药卫生、文化艺术和工业企业界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及厂长、经理名单(磁盘录入、激光打印且均注明详细地址、邮编),这对于科技情报、供销、人事、信息部门了解、掌握人才信息库有着重要研究、使用价值。现拟有偿提供。联络地址:长沙市南区扫把塘一村55号编委会,邮编:410007。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编《国外经济科技社会发展考察与研究》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3年10月出版发行。全书收考察报告58篇,计45万字,定价14.50元。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主编《东西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12月出版。全书收中外学者论文43篇,计43万字,定价12.5元。

(张)